

从考古发现略论汉唐时期 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贺菊莲

(贵州财经学院 国学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 饮食文化是认识和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包括内地饮食文化在内的西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祖国内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 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物品种的西传, 生产技术、日常饮食用具等的西传, 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

[关键词] 汉唐时期; 饮食文化; 西域

[中图分类号] K89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0)02-0017-04

虽然西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文化内涵, 但新疆大地自公元前2世纪迄今, 却总是中国西域大地上的核心处所。它居于亚欧内陆腹地, 古代丝绸之路枢纽, 向为(尤其是公元10世纪以前)我国与中亚西部、南亚、西亚交往、联络的孔道, 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季羨林先生认为: “世界上四大文化都汇流在一起的地方, 只有新疆一处, 此外没有任何地方。新疆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种的地区……丝绸之路横亘其间, 东西文化不远千里来此交流, 为东西各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亚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亦认为: “新疆地区是全世界惟一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相混融的所在。”

本文所指西域主要指古代新疆。古代新疆在公元前60年就统一于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 而早在先秦时代, 中原与西域就已存在着经济、文化联系。在秦王朝以前, 中原内地居民就已进入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有: “宛城中新得秦人, 知穿井。”“秦人”当指祖居中原、后来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居民。中原汉人与当地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域文化。

饮食文化是认识、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汉唐时期, 祖国内地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形成互动, 前者极大地影响了后者, 后者又丰富和发展了前者。本文在此主要探讨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饮食品种的西传

粟原产于中国内地, 早在汉代之前就已西传西域。

桃和杏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 这是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事实。桃和杏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波斯、印度等地。而当它们西传的时候, 首先在祖国西陲生根繁殖。如在尼雅遗址就发现当地居民在住宅附近不仅栽有成排的葡萄, 还有桃树和杏树。

曾有学者认为: “古代吐鲁番地区可能种有核桃和扁桃, 但未种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 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的名称有写作蒲陶、蒲桃、浮桃、蒲桃、陶、桃的, 而桃则是这一地区葡萄的特称。”但是, 除尼雅遗址之外, 桃在汉晋时期的楼兰遗址内, 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能见到, 出土物均是桃核。可见, 桃应是吐鲁

^{*}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是隶属于中国城科委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一个非营利性学术机构, 致力于研究、弘扬丝路文化, 提供学术交流和城市宣传平台。本文作者贺菊莲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番人们的口中美味之一。吐鲁番古墓地内也曾见到杏核。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品中发现有属于唐西州时期杏干,出土文书《古写本医方一》中也有“杏人”(应是杏仁)入药的记载。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唐代饺子和馄饨实物,形状与现代同类食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59年发掘的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了食物,如“301墓发现面制饺子三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饺子长约5、中宽1.5厘米。301和302墓都出有面制龙形残段,是用面皮捏合成的,外面压划文饰。另有面条、面饼之类,并有面制插座。至于粮食,除上述粟、黑豆之外,还发现有紫穗麦”。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第十次发掘时发现“饺子5件。72TAM151:88。薄皮、内有馅。长4.5、宽2.2、厚1.1厘米。另还发现面俑2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中也有“饺子”的图文介绍:“饺子唐(618~907),长6厘米、宽2.3厘米,1960年自吐鲁番阿斯塔那339号墓出土。为小麦面质,形如月牙,皮薄,内有馅,与现在水饺无异。饺子在当时称‘水角’、‘角子’或‘牢丸’等。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之一,早在唐代就已成为了吐鲁番地区居民普遍食用的一种面食。”^⑩

二、生产技术、日常饮食用具等的西传

汉晋时期,内地一些饮食用具已传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从出土文物来看,汉晋西域一些饮食用具又和内地属于同一系统。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同类之物在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证。古代俎匕连用,俎是‘载牲体之器’,匕是‘取牲体之器’。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形制简朴,而和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等地出土的木匕或漆匕仍属同类工具。尼雅出土一件木匕上写佉卢文,证明匕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使用之物。特别重要的是尼雅遗址还发现了木箸,说明这种我国特有的吃饭用具早在汉晋时期即已传入西域。”^⑪

出土的漆器与瓷器制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饮食用具。“据考古资料可知,漆器是仅次于丝绸而最早传入西方各国的,而古代新疆各族人民不仅是漆器西传的传播者,也是精美漆器的享有者。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中国漆器及漆器制造方法沿丝绸之路西传中

留下的珍贵文物。”^⑫就新疆地区出土的瓷器来看,既没有发现瓷器窑址,也没有逐步制瓷业年代的发展史。从考古资料、实物和在新疆地区流散在民间的瓷器分布情况可知,新疆所发现的瓷器都源于内地。^⑬

内地饮食用具西传西域的具体例子还有釜和甑等,如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内地常见的一套炊器。“在挖造阿斯塔那墓葬的时代,人们似乎使用过漆成黑色的木盘。木盘呈四边形,边角都做成了圆形,备有两个鱼尾形的把柄。在已被断代为541年的一座墓葬中也曾发现过一件这样的器皿。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发现的日用品形状古老性使所有的考古学家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物品与中国汉代所使用的器皿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吐鲁番地区,经常使用的似乎就是汉地的器皿,至少在高昌城完全是这样的,人们曾经在那里发掘到了一些筷子。某些女供养人就餐时所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汉地碗和汤匙。”^⑭

早在西汉时期,祖国的文化就不仅遍及南、北两道,而且到达天山以北游牧民族地区。诸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1961年,昭苏县西汉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圆唇小口,底小腹鼓,是汉代陶罐常见形式。^⑮

三、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

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资料明显反映出西域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察吾呼沟其他几处古墓地,墓主人的头均向西北,而三号墓主人则头向东方,与吐鲁番地区的魏晋墓葬情况相仿。M18出土的项珠中有两枚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玳瑁龟,这是我国古代十分贵重的东西。相传龟有千年之寿,“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墓主人项戴乌龟项链,以祈长命百岁。这表明由于汉朝统一新疆,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⑯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大批同时期的汉文文书、典籍抄本及艺术品。由于唐代文化空前繁荣,因此,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汉与西域的政治交涉从武帝时开始以来,有汉之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汉文化不言而喻也随同他们进入这里。这从近来东西探险队所获许多属于汉文化的资料可以看出……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自古以来就已及于

此地的事实。”^⑧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乌孙、楼兰、鄯善、龟兹、高昌国的埋葬制度深受汉晋中原文化的影响,如覆面、握木、男女合葬等现象。变量衡制、中原铸币的形制等也都渗入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可发现,这里受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⑨这些都决定了中原饮食文化、饮食礼仪对西域饮食文化浸染的必然性。

从以下具体实例不难看出中原饮食礼仪、观念对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阿斯塔那墓葬随葬器物普遍为灰陶,有灯、釜、甑、罐、壶、盆、瓮、盘、碗等,器型较大。瓮上有墨书“黄米一”、“白米一”,反映了汉魏中原地区风尚在这里的影响。^⑩

祖国内地饮食礼仪西传的另一具体体现为中原内地节日饮食礼俗在吐鲁番大地的再现。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在南北朝时,粽子的名称已逐渐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为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的节令食品。”“汉代至魏晋是端午节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则是端午节定型化、成熟化的阶段。”^⑪几千年来,这一民间习俗广泛流传,每逢端午,炎黄子孙几乎都在沿袭用之。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拣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时,曾发现了混于文书纸屑中的一件草编粽子。粽子采用草篾编制而成,共有五枚,均呈等腰三角形,与今日北方部分地区民间所食用的粽子的形状如出一辙。从这件草编粽子的形式看,应是悬挂于儿童身上的饰物。时至今日,在端午节这一天仍有很多人要用五彩线编成小粽子,挂在孩子们的胸前以讨个欢欣和吉利,而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尸中也恰恰有一具儿童干尸,这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印证。^⑫端午节吃粽子这一民俗事项何时传入新疆地区,已无据可查,但至迟在高昌时期就已经得以流传。

另如寒食节。寒食节的形成源于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及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隋唐五代时期,“无论贵贱贫富,

对过寒食节都是非常重视的”。^⑬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课钱帐历》共41件,其中第34件记有“张三便二百文,许过寒食五日内分付了”,^⑭说明唐代吐鲁番人也过寒食节。

冬至、腊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内地传统节日,文书中也有高昌人民过这些节日的记载,就连寺院都不能免俗。如《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中记载:“9 二斛五斗,尽,供冬至日用。”“17 四斗,得钱一文,买麻子。五斗,用作羹。尽,供腊日用。”“麦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19 六升斂。粟四斛五斗,用买驮被毡一领。枣三斛,供腊日用。”“38 □□斗,供三月三日食。”“58 祀天。麦二斛七斗,得钱三文,麦一斛五斗,作面,麦□斗买落。粟五斗,作饭,59 三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⑮“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统事业的实现,三州、四镇的汉人既有内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总纳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不少全国性的节日必定影响至此,例如年终腊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阖家庆团圆,七月七日乞巧节等,此外,从高昌祀部文书中还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贰谷天大坞阿摩,献羊,三月二十四日为丁谷天树石,虽是纯地方性节日,亦必照旧承袭下来。”^⑯

中原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也有大批内地移民在这里居住。他们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互通有无,生产技术上互相学习,生活习俗方面互相摹仿。”^⑰

四、结语

自古以来西域既保存了其土著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原文化及西来文明。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文化。饮食文化的交流促使西域饮食文化具有多元成分:土著饮食文化、汉饮食文化及西来之饮食文化。上述中原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体现了西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西域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的西域饮食文化既有中华饮食文化共同的性质,又有区域性饮食文化相对的差异性。

[注 释]

- 王炳华主编:《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陈习刚:《吐鲁番文书中葡萄名称问题辨析——兼论唐代葡萄的名称》,《农业考古》,2004年第1期,第154~162页。
- 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106页。
-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47页。
-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11页。
- 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百石缘工美有限公司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香港金版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 ⑩王进玉:《北朝以前漆器在新疆的流传》,《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第59页。
- ⑭殷福兰:《阿力麻里出土的元代瓷器及其相关问题》,《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第125~128页。
- ⑮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页。
- 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王炳华、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 ⑱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2~164页。
- ⑲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1~4页。
- ⑳姚伟钧:《汉唐节日饮食礼俗的形成与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8期,第73页。
- ㉑王珍仁,孙慧珍:《吐鲁番出土的草编粽子》,《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6~117。
- ㉒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0~651页。
- ㉓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 ㉔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231页。
- ㉕薛宗正:《唐代西域汉人的社会生活》,《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80页。

探索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术长卷——《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20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大型学术著作丛书,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以传统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注重学术观点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人口、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丛书共计870万字,配有3200余幅图片和英文目录。其书目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之路岩画研究》、《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研究》、《丝绸之路宗教研究》等。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贯穿了文明交流的真谛,各卷内容都在充分吸收了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成果基础上,以大量精确而具有说服力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大视野、多角度拓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外延,极大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以往丝绸之路探索范围,将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的出版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国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空白,开辟了新疆历史著述中的新天地,为正确阐述和宣传新疆的历史、民族发展史和宗教的演变史以及推进新疆学术事业的发展进步发挥重要作用。